

自序

自1982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之后，从丁聪开始，我陆续结识“二流堂”群体的不少人，如夏衍、唐瑜、叶浅予、冯亦代、郑安娜、吴祖光、黄苗子、郁风、高汾、高集、吕恩等前辈。

“二流堂”最初形成于抗战期间的重庆。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谈及这一文人群体的特点：“这是战争期间特殊条件下文人之间一个特殊汇聚。既非自由组合的艺术团体，也非艺术趣味和追求相同的某一艺术流派，不过是艰难情形下的一种物以类聚而已。他们不属于那种甘于寂寞偏爱孤独的艺术家的，而是喜欢热闹，喜欢轻松自由的气氛。他们是天生的乐天派，即便生活条件再艰苦，他们也乐意汇集一起用暂时的快乐来忘掉生活中的烦恼。他们各自的领域和成就有所不同，但才华均以不同形式显露出来。对于这样一些人，无拘无束恐怕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该笑就笑，说哭就哭，悲悲喜喜，蹦蹦跳跳，随情形而定，随心境而发，一切顺其自然，绝不强求。”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二流堂”又在北京形成新的文化圈。在数十年的不同历史时期，聂绀弩、王世襄、张光宇、张正宇、杨宪

益、黄永玉、范用、黄宗英、黄宗江、姜德明、邵燕祥、杜高等，都与重庆时期“二流堂”友人经常聚会、唱和，堪为北京文人交往的一大景观。

这些年来，我写过一些叙述“二流堂”人与事的文章，此次应柳鸣九先生热情相邀加盟“本色文丛”，他嘱我不妨围绕这一内容编选。在此，感谢柳先生的厚爱，感谢海天出版社的支持。

一个好建议，我遂将相关文章略加整理，起名为《风景已远去》。

全书分上、下两辑。

上辑为长文《亦奇亦悲“二流堂”》，叙述“二流堂”的历史渊源，乃至数十年间，这一群体中不同人物的命运起伏，与中国政治风云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联，藉此能为读者提供较为清晰的脉络和轮廓。

下辑为我所写的“二流堂”不同人物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或长，或短，基于史料，辅以印象，力求点点滴滴的细节，能使笔下人物在历史场景中的悲欢离合，变得具体而生动，同时，能让读者感受到这些人物心底永远流淌的文化情怀……

李辉

2015年4月8日，北京

亦奇亦悲“二流堂”

“碧庐”命名“二流堂”

1943年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一批文人、艺术家汇聚这里。他们嬉笑怒骂，无拘无束，在战争阴云密布的这座城市里，如同一束快乐光亮，让自己的生活多少显得浪漫、轻松而丰富。这批人便是后来被称为“二流堂”的成员。

他们是丁聪、吴祖光、吕恩、冯亦代和夫人郑安娜、黄苗子、郁风、金山、盛家伦、唐瑜、凤子、高汾等。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在上海早就熟悉的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等其他一些漫画家。而夏衍作为中共在文化领域的领导人之一，和他们有着密切关系，受到他们的敬重，无形之中也就成为“二流堂”人们的主心骨。于是，在“文革”中夏衍被说成是“二流堂”的总后台，并不令人意外。

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界定他们，也很难将他们一一描述，但他们却又是不能忽略的一群人。因为，“二流堂”这一特殊的存在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随着“二流堂”的形

成与演变，随着他们由此而在 1957 年、“文革”中蒙受的磨难，他们的命运在风云变幻的现代中国具备了沉甸甸的历史分量，留给人们加以解说和思考的话题。

与“二流堂”有关的这些人的职业和兴趣各不相同。

唐瑜是电影界赫赫有名的报刊编辑和热心人；丁聪是风格已独成一家的漫画家；吴祖光是被称作“神童”的剧作家；金山是享誉话剧、电影界的大牌明星；黄苗子是著名才子、漫画家；郁风是画家，也是一位新闻界、妇女界的活跃人物；冯亦代是喜爱海明威的翻译家，尽管他的身份是中央印铸厂副厂长，负责钞票的印制；盛家伦是歌唱家，他为《夜半歌声》演唱的主题歌，风靡一时；凤子是话剧演员，同时也是记者和散文家；高汾是年轻记者，永远精力旺盛，风风火火；吕恩是活跃于舞台的话剧演员……

没有唐瑜的热心慷慨，就没有所谓的“二流堂”。他被戏称为“二流堂”堂主。

这是一个旷达、幽默、豪爽、热心的人，即便到了晚年，历经沧桑之后，他也仍然如故，完全一副性情中人的洒脱。

唐瑜是一位归国华侨，早在 1929 年就与潘汉年结识，并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开始了左翼文化活动，与夏衍等人也非常



夏衍

唐瑜

吴祖光

“文革”中被丑化的“二流堂”人物漫画

熟悉。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批流亡在重庆的朋友的中心。他的胞兄是缅甸的一位富商，对他常常予以慷慨资助。抗战期间滇缅公路通车之后，唐瑜曾经回缅甸仰光一次，返回重庆时，胞兄送给他两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轿车，一辆卡车上装有当时可以畅销的物资，一辆卡车上装食品，供重庆的朋友们享用。需要用钱时，唐瑜就拿出一部分物资去出售，最后把车都卖掉。吴祖光亲眼看到过这样一个场面：

吴祖光和唐瑜一起走到重庆中一路一个路口，远远开来一辆十分豪华而崭新的小轿车。一看见车，唐瑜便忽然停步不走。当时大雨初晴，路上积水很深，汽车飞驰而过，他们躲闪不及被溅了一身污水，唐瑜的脸上也是泥点。他没有反



叶浅予



黄苗子



丁聪

“文革”中被丑化的“二流堂”人物漫画

应，只是呆呆地注目轿车，一直等它失去了踪影之后才对吴祖光说：“这车是我的。”

唐瑜几乎成了重庆这批朋友们的“摇钱树”和后盾。此时从香港、桂林流亡到重庆的文人，大多穷困潦倒，衣食住行是最大困难。唐瑜便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建筑师”。竭其所能，为熟悉的朋友提供住所，是他表现其古道热肠的最好方式。

夏衍带着妻子儿女一家四口来到重庆，唐瑜便在临江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挤出一间小屋。夏衍回忆，随后，唐瑜卖掉哥哥送给他的半只金梳子，在中一路下坡盖了两间“捆绑房子”（战时重庆穷人住的泥墙、竹架搭的一种特殊建

筑)。唐瑜和夏衍各住一间，没有门牌，为了寄信方便，夏衍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面写了“依庐”这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黄苗子信中所说“依庐”即唐瑜和夏衍的家。

见到来到重庆的朋友愈来愈多，唐瑜索性盖起一幢两层楼的大屋子。他将在昆明与人合资经营的一家电影院的股本转让他人，用这笔钱在离“依庐”不远的坡下租上一块地，自己绘图设计，亲自监工建造，盖起了一间可以住十多人的屋子。用夏衍的话来说，唐瑜“呼朋引类”，让当时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

唐瑜新盖的这所房子，起名为“碧庐”，取“壁炉”谐音。因为唐瑜喜欢壁炉，在大客厅里专门砌了一个漂亮的壁炉，在当时的重庆，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

碧庐建成，曾举行一次舞会庆贺，重庆文化界名流云集，中共方面的人士如乔冠华也和几位朋友前来助兴。他对唐瑜的这一建筑杰作颇为欣赏，盛赞其具有西班牙建筑的特色。从此，碧庐成了重庆文化界的一个热点。

先后在碧庐住过的有吴祖光、吕恩夫妇，金山、张瑞芳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至于夏衍、黄苗子、郁风、冯亦代等，则是这里的常客。

“二流堂”名称的产生，与来自延安的秧歌剧直接有关。

吴祖光写道：

给大家较深印象的是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表演，演出的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这种表演形式大家都未之前见，感觉十分新鲜。在剧中的对话里，听到一个很新鲜的未之前闻的陕北名词，就是妹妹送饭，原在开荒的哥哥假装在地里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二流子”，就是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大家打动了。文艺工作者生活大都没有规律，夜里不睡，早晨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尤其是盛家伦，生活太没规律，而且读那么多的书，却一个字又不写，大家说他“光吃不拉”，叫“二流子”是从他开始的。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志等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互称二流子。郭老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徐冰叫大家拿纸笔来，请郭老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得作罢。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二流堂”奇冤大案》）

“二流堂”的故事从此开始。20世纪50年代，还是

“二流堂”中的这些人，又汇聚在北京，又一起住在一个院子里。历史的负重，到那时才会落在他们身上，此时在重庆，他们谁都不会用悲剧来设想未来。唐瑜后来感慨地说：“其实二流堂也就是这么个战时重庆文化人临时寄居聚会闲谈的场所，得名也不过是一时的偶然玩笑，不曾想几十年后风云变幻，堂主受累不说，堂员却无端倍增，直闹得沸沸扬扬，轰动四方，株连无数，酿成大祸，实在也是我多事之罪也。”（《二流堂纪事》）

嬉笑怒骂即人生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对万事万物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有对现实状况的敏感观察与反应。虽然他们很难说思想多么深刻，目光多么犀利，但是，他们近乎透明的性情，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是非感，该恨就恨，该骂就骂。

不过，这里绝非一种政治场合。他们既不是职业革命家，也不是政治性十分强的人物，而是一群性格鲜明的艺术家。

这是战争期间特殊条件下文人之间的一个特殊汇聚。既非自由组合的艺术团体，也非艺术趣味和追求相同的某一艺术流派，不过是艰难情形下的一种“物以类聚”而已。他们

不属于那种甘于寂寞偏爱孤独的艺术家的，而是喜欢热闹，喜欢轻松自由的气氛。他们是天生的乐天派，即便生活条件再艰苦，他们也乐意汇集一起用暂时的快乐来忘掉生活中的烦恼。他们各自的领域和成就有所不同，但才华均以不同形式显露出来。对于这样一些人，无拘无束恐怕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该笑就笑，说哭就哭，悲悲喜喜，蹦蹦跳跳，随情形而定，随心境而发，一切顺其自然，绝不强求。

唐瑜的散淡、风趣姑且不论，这里另外一个重要角色盛家伦，则是又一个典型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家形象。

在朋友眼里，盛家伦是他们中间难得的通才。他有一副独特的嗓音，用吴祖光的话来说，既非高音又非低音，有着特殊的味道。他中外文俱佳，常常抱着一摞外文书阅读，床头、地上都堆满着书。这世界上他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似乎什么都精通。世界史、音乐史、美术史等等，他都有系统研究。乔冠华来，可以侃侃而谈国际形势战争走向，令乔冠华也为之叹服；徐迟来，可以谈现代派艺术……来往于这里的人大多有各自的专长，但很难有人像盛家伦这样在不同领域有很深造诣。

可是，盛家伦却是最为懒散最为散淡的一个。他疏于著书立说，甚至连一篇文章都不曾写过。后来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朋友们都为他的才华和学识没有得到表现而感到莫大遗憾。可是，他从来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依然我行我素。他还甚至和黄苗子比赛，看谁在书店里偷的书最多。别人睡觉他看书工作，别人工作他睡觉，时间没有固定，生活没有规律。

不仅仅他一个人，住进这里的艺术家大概因职业缘故，也都习惯了这种没有规律而自由散漫的生活。

漫画家黄苗子也是他们中间一个个性特别的人物。他天性活泼幽默，有时甚至导演出一次又一次的恶作剧，令人啼笑皆非。丁聪，还有后来在重庆时期结识的吴祖光，包括黄苗子本人，都讲述过黄苗子 40 年代在重庆和上海的几件往事。

黄苗子回忆：

一次我同丁聪去参观一个介绍近东地区风光的展览会，我觉得一张印有埃及古壁画的明信片美极了，就忘了父母和师长教导的道德准则，情不自禁地把它放入皮夹内。等到将要出门，一位认识我的管理人伸出手来，十分礼貌地说：“黄先生，这明信片等展览会开完，由我们送到府上好吗？”……像这些事情，却使旁观的丁聪急得满头大汗，好像他自己在做这些错事似的。（《不会老的小丁》）

丁聪回忆：

有一次在上海，我去看一次展览，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有一幅展品丢失了。我走去一看，只见上面还贴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神偷手到此一游！我一看就是苗子的字。

还有一件事。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吴祖光在上海编《清明》杂志，住在大世界旁边的共舞台的三楼。苗子那时住在南京，有时到上海就来我们这里来，大家吃玩玩。有一次，他走后第二天我们发现房间里的观音铜像没有了，就猜想肯定是苗子拿走了。后来我到南京去，果然发现就摆在他的客厅里。问他怎么拿的。他说，天气热，他把西服放在铜像上，走时就顺手牵羊偷走了之。（与李辉的谈话，1996年8月12日）

吴祖光讲过一件更具传奇色彩的事情：

有一次苗子到杜月笙家里去玩，走的时候就顺手拿走一件工艺品。过了几天，杜月笙派人到他的住处，对苗子说：

“黄先生，杜先生让我来问你，上次你借的那件东西看完没有，要是看完了，他让我今天就带回去，要是没有看完，



1944年，三对夫妇与苗子的母亲在一起。左面一对为戴爱莲、叶浅予，中间一对为郁风、黄苗子，右面一对为郑安娜、冯亦代。

就还放在你这里。”苗子当然说看完了。（与李辉的谈话，1996年9月3日）

不过，对这一回忆，黄苗子略有补正。他说杜月笙的家里他未去过，应当是到杜月笙的俱乐部“恒社”，那是杜的高级徒弟们出入的地方。

正是这样一些性情散漫、不拘小节，却又才华出众的艺术家，构成了“二流堂”的主体，形成了“二流堂”与众不同的特色。

选择

“二流堂”人士在重庆，做出他们一生中的重要历史选择——政治天平偏向了共产党。

做出这样的选择，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他们目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尔虞我诈。抗战初期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无私、无畏，随着战争的一天天延续，渐渐淡去。越来越多的官员，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热衷于饱食终日，中饱私囊。没有理想，没有创造激情，无疑是这些艺术家最为鄙视的人生。生活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他们赞成共产党对国民党专制、无能的批判，赞成共产党不断提出的关于民主、自由的主张。和许许多多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将共产党的存在视为民主与自由的一种象征，视为最终能够实现多党制的可能性。

“二流堂”人士能够选择共产党，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是通过所熟悉的共产党人来接近、接受共产党，而非单纯的书本上、思想上的皈依。

从30年代上海时期开始，他们所接触的共产党党员，都以不同方式在他们面前展示人格的魅力。从王昆仑、廖承志、潘汉年、夏衍、乔冠华等人身上，他们感受着智慧、

幽默、才华与真诚。这些共产党人，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与热情，但又与他们一样拥有艺术家的潇洒，有超乎常人的学识。这些共产党人，不是冷冰冰的面孔，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而是与他们一样有种共同兴趣共同爱好，甚至有着相似的性格缺点的人。这样的革命者，令他们尊敬，令他们亲近，进而也就有可能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们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不能忽视这样一种个人魅力的影响。特定历史环境中，在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方面，它甚至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流堂”中的这些艺术家，乃至他们周围的其他许多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和感觉。难以想象，没有廖承志、潘汉年、夏衍这样一些中共领导者的存在，会有那么多文化人，相继将政治天平偏向了共产党。

他们大多数人无党无派，但政治倾向是明确的，这就是反对国民党，向往共产党，并且乐意在共产党人夏衍的影响下、领导下，做一些颇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有些人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曾家岩 50 号的常客，而他们的居所也成了当时重庆文化界朋友们可以高谈阔论自由交流的场所，甚至一些共产党重要人物的碰头会也时常选在这里。

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也发现了碧庐与共产党的关系，还

专门安排人员进行昼夜监视。唐瑜在回忆乔冠华的时候，颇为生动地描述过这样的场面：

曾家岩有人失踪了，他深夜约人到“二流堂”商量营救之法。

他被特务盯梢，他跑到“二流堂”门口，回头向小特务说：“你回去告诉头头，我就在这里，你们上面有人看着。”在离堂数步的坡上，有一个小茶棚，每天有几个特务在那里打麻将，正对着“二流堂”楼上的窗户，里面也有一桌麻将，似乎是在打对台。（《乔冠华和龚澎》）

特殊环境中的政治形态和生活状态，绝非如后来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绝对和概念化。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中，个人的选择，不可能红是红，白是白这样容易判断。假如看待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就不免显得过于简单而肤浅。

抗战胜利后，重庆时期的“二流堂”人士分别前往上海和南京。在南京，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要职的黄苗子和夫人郁风，条件优裕，这样，“黄公馆”再次成为朋友们常来常往的一个温暖所在。来得最多的还是“二流堂”的那些朋友。金山、高集、高汾等，经常到“黄公馆”。后来局势紧张